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3.013

# 数字时代下身体的两种向度 ——反身操纵与主动控制

王婉晴

**摘要：**人类迈入数字时代，各类媒介技术为身体提供便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对身体由内到外的表征异化改写。对技术发挥其运作效力逻辑的剖析则进一步揭示个体已然无意识陷入资本与技术合谋构建的伦理困境。在双向度的背离中，身体焦虑无以复加，而在当下人机协同发展新常态里，则指出身体的两种向度并非导向二元对立，而是提供另一种可能，即对身体与技术关系的两相平衡意义的探求，能唤起人们对身体主体性的重视，有助于缓解身体失控引发的焦虑。

**关键词：**数据算法；数字技术；身体主体性；身体焦虑；内在平衡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4)03-0107-08

收稿日期：2023-12-01

作者简介：王婉晴（2000—），女，广东兴宁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及文艺美学，E-mail：702666586@qq.com。

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催生出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而成的一种新型媒介生态，即数字时代。越来越多人被卷入数字化实践当中，人们看似自如运用数字技术，掌握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轻而易举地实现“有什么了解什么”到“想了解什么就了解什么”的转变。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合谋下，身体没能迎来自由与解放反而迈向被信息洪流异化的深渊。身体从“信息广域”中走向“信息孤岛”，正经历着信息洪流对身体主体的反身性操纵，与身体主体意图摆脱操纵而对技术进行主动控制的两相挣扎。本质上，这是因为技术的运作正实施“对人体的功能性侵入，即进行技术监测和干预”<sup>[1]</sup>，在这种负面效应下，身体自主性受到极大削弱，并呈现出多种身体失控的异常表征。为此，从解析数字技术如何影响身体的运作逻辑入手，重新审视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激发人们对身体主体性的重视，唤起人们对身体内在生命意义平衡的寻求。

## 一、身体失控：信息洪流下异化的身体表征

从梅洛·庞蒂了解世界的认知观来看，身体是所有知觉和行动的根本来源<sup>[2]</sup>，是我们感知世界最直接的形态与方式。但随着数据技术的更新迭代，借助技术辅助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外界信息的获取变得更为便捷的同时也更为敏感，由此也触发许多负面效应，比如“信息茧房”与“回音室”。前者是指个体习惯性被感兴趣的信息所引导，排斥不感兴趣的信息，久而久之个体会被困顿于有偏向性的信息选择里面如同作茧自缚<sup>[3]</sup>。后者是指在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人们思考与诉求极易被同质化，一些相近的诉求会不断以夸张或扭曲的形式被重复，长此以往会造成个体眼界的狭隘与思考偏执化。这些负面效应出现正颠覆人们以往对身体的认知，在信息技术的介入下正转化为唐·伊德提出的技术身体，即“我们的身体体验是对于技术建构起来的身体的体验”<sup>[4]</sup>。投身数字化实践中的身躯获得的身体体验是由虚拟身体所传递，这种体验感知是间接的，无法直接验证真伪，个体只能依仗技术作出判断，长此以往身体的自主权便被信息技术所移位。在信息技术的干预下，身体不可避免地被量化为各种数据与信息，再加上外界海量的信息轰炸之下，个体思考难免不能做出理性判断，而服从于技术提供的对疑难问题的现成解答则成为最快捷的解决方法，自此信息技术便完成对身体主体的逐步蚕食，并逐渐显现出异常。

首先，被诱导的身体诉求。当下网络短视频成为人们了解社会动态最流行且最快捷的方式，借助其视频时长短、低技术门槛、社交覆盖面广的传播特征，其衍生出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身体审美文化，即“审丑”现象。它与传统认知中相对审美而形成的审丑文化不同，并不以凸显事物美和感受到审美愉悦为落足点，也不要求唤起人们一种否定性的审美体验<sup>[5]</sup>，更不是挖掘事物美丑统一和谐的本质。以展演身体丑态而备受人们追捧的网红“药水哥”“人类高质量男性”“武术大师”马保国等人为例，他们在短视频里的形象无一不是以猎奇怪异的穿着打扮或以哗众取宠的夸张言行，竭尽所能地展示与美相悖的丑态吸引人们的关注。显然，这种“审丑”现象已背离传统美学认知的范畴，但能受到人们争相模仿与追捧无疑是因为这种丑态的显露冲击着当下审美疲劳的文化常态，获得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而在数据算法技术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审丑”风气便很快地蔓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再加上对“审丑”文化的推崇是个体出于感性的判断而非理性的思考，并迎合人们对于低级趣味的沉迷，由众多个体形成的“审丑”意识便汇聚衍化为群体的“审丑”风尚。本质上，大众的“审丑”身体诉求趋同还在于人们对娱乐快感盲目的无止境追求。而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视觉媒介与社交媒介无形放大这种“审丑”现象在社会中的反响度，当人们深陷这种具有偏向性的信息选择趋向中，无疑个体作出的判断便失去理性思考。换言之，数字技术构造的网络世界是具有诱导性的，它在无形中建构和规定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见，并能潜移默化改变人们的认知<sup>[6]</sup>，使得一切在其中的现象都能以符合逻辑自洽的形式出现，这同时也针对人性中的弱点，即大众对视觉快感即刻满足的寻求和无理性的视觉狂欢氛围的沉浸。自此，人们对美丑的认识失去客观理性的判断，身体对审美的诉求表达则被诱导同质化。

其次，被形塑的身体外观。显而易见，当代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并远远胜过关注其他事情<sup>[7]</sup>。如果说，从前对身体的审美与欣赏还停留在孤芳自赏的私人话语层面，如今身体形象的展示正成为大众热议探讨的公共审美话题。故展演身体形象成为当下的一种社交常态，人们乐于在个人的社交平台账户上分享身体的状态，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记录身体形象。随着社交媒介与数据算法的融合，越来

越多媒体为迎合市场需求和消费受众需要,基于融媒技术的特性而向个体推送许多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身体形象信息。因此,展演身体的风尚有了质的转向,人们为迎合媒体口中的“审美标准”而不惜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像是在女性群体一度流行过的被喻为性感身体模板特征的“A4纸腰”和“凹型肩胛骨”,为了能达到这种模板式的“理想”身材,很多女性为此不惜进行节食或吃减肥药进行瘦腰,若身材存在外形反弹甚至会进行整形手术以从视觉上达到这种身材效果。诚然,媒体宣扬的身体审美范式为大众提供一种可借鉴的身体审美形象,并形成一种审美标杆,但这种“身体话语”形成的背后实质,并不是基于健康良好的导向来引领一种身体审美思潮,而是变相对身体外观进行审美规训。换言之,媒介技术为个体交流各异身体审美认知提供分享平台,但个体的话语力量是有限且薄弱的,体量庞大的大众媒体利用自身的号召力轻而易举就能覆盖个体信息话语的存在痕迹,并最终掌握评判身体审美标准的话语权。最终,我们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是大众媒体包装修饰过后推出的“身体偶像”,再经由信息算法的不断反复推送,潜移默化之下影响人们的审美认知,由此人们便陷入认知过载的状态中,盲目地偏听偏信,无条件地信任平台推送的信息内容<sup>[8]</sup>。身体审美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身体外观认知素养与审美认识具有天然差异,而大众媒体口中的身体审美标准却将个体的差异化与独特性抹去,试图以流水线般模板化的审美取而代之,这是对自然健康的身体存在进行扼杀,更是对身体审美认知的扭曲。

再次,被掌控的身体节奏。列斐伏尔在研究社会空间时发现忽略时间视角的空间研究是不完整的,而要研究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则需要将关注落在身体上。他认为“某种遥远的秩序的根源,只能根据离我们最近切的秩序,也即身体的秩序来解释”<sup>[9]</sup>,由此便提出节奏分析理论,他认为世间存在一种时间节奏正统驭着自然节律所产生的一切兴亡衰败,而身体是最直接的感受主体。在数字时代视角看来,我们个人的身体节奏正被无数信息内容碎片化,并在技术的推动下被迫加速。以短视频内容为例,其视频时长控制在1到3分钟以内,目的是让用户在短时间内能掌握信息的关键内容,使得闲置的碎片时间能被最大效益化利用。然而,无门槛的内容推送机制,将信息技术的成瘾性发挥到极致,人们只需轻轻上下滑动屏幕并对自己偏好的内容点击喜欢就能轻松观看到源源不断的新内容推送。细而言之,看似身体充分发挥能动性运用技术充实个人生活,将闲置的时间空隙逐一填满,实则浏览海量信息的过程中,身体完整的节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当人们在刷视频时,个体的时间节点被线性化,但并非以绵延的形式存在,完整的身体思绪与体验便被频繁“刷新”的步骤中断,长此以往身体陷入“短平快”的加速节奏中而不自知。如此,当身体的感官与节奏被信息洪流所裹挟,迷失在繁杂而极具诱惑力的资讯中,个体便会失去合理且规律的节奏参照,身体的判断与思考便会日趋钝化迟缓,更易沦为“单向度的人”。

最后,被窥探的身体意识。基于血肉之躯无法直接进行数字实践,虚拟化身便应运而生。在信息技术与数字躯体实践的互动过程中,躯体被技术介入,身体的物理属性被转化编译为信息属性的数据,只要身处于数据信息被记录、收集、跟踪的媒介生态中,身体便无时无刻不被“监控”。可以说,数字媒介与身体的接触越深入,物质身体被数据化的趋势越明显,技术对身体意识的掌控则会越全面。从表面可直接获取的身体信息来看,电话号码的实名制及社交媒介平台上地域IP的直接显示,都将身体的文化与社会属性直白地呈现在大众眼前。对于用户而言,这些信息是服从社区平台管理的凭证,而在技术语言的转译下,这些信息便成为技术媒介打造用户内容偏好数字模型的数据之一。例如在微博社区中,人们喜欢在其中分享个人情绪、生活状态、想法观点等动态,而转发、评论、点赞等设置则将私人空间的信

息转化为公共领域中大家可见的信息。看似是普通的个人状态分享,但在后台数据算法的整合下,所有的举动无异于在逐步细化个人的身体信息,帮助信息媒介完善个人数据模型的构建,而个性化广告推送就是身体数据收集完成后的成果。此外,能更为贴近身体并直接进行数据采集,则是佩戴运动手环和身体状况实时监测的智能设备。只需要个体与设备进行绑定,设备会智能地扫描全身完成“数据身体”的建构,再根据用户行动的偏好或作息习惯,推送定制化的运动作息安排,这也正是为何有些用户常常发出智能设备“深得我心”感慨的原因。诚然,智能媒介对身体数据收集得越全面,技术越能更好地辅助我们了解身体,但身体信息的隐私也随之荡然无存,并极易引发技术伦理或人性道德等方面问题的纠纷。如今,信息技术与身体融合存在一种新范式,即刻写了个人身份信息并拥有定位功能的智能芯片可植入人体,因此我们应重视信息技术对身体意识的窥探带来的负面效应,警惕技术对身体意识的过度介入。

庞杂的信息数据正以一种无形的手段潜移默化地对身体进行由内到外的深刻改造。一方面,我们正享受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便捷,在技术的辅助下对自我的身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彰显人们对信息技术运用娴熟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信息洪流也在干扰人们做出正确判断,身体被数字媒介规训与监控,无意识服从技术理性话语做出反身性选择,并形塑为理性技术理想中的模样。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困境里,仅看到身体正呈现身不由己的异化表征无疑是单薄而表面的,毕竟身体是意义的生成器,其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地展示信息,并对个体的言语及行为产生影响<sup>[10]</sup>。从这一意义而言,探究理性技术如何对身体自主性施加威压并进行干预,有助人们直面身体在当下失衡的现状。

## 二、运行法则:数字技术影响身体自主性的权力逻辑

信息技术使身体对世界周遭的体验感知更为灵敏且多样,但身体异化表征的出现又让人们警醒,时至今日身体依旧是多种权力互相角逐的场域,且身体从未摆脱身处于过去福柯笔下全景敞视监狱的阴影,正如其所言“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sup>[11]</sup>。在这场争斗中,身体是主动的控制者与创造者,同时又是被动的迫害者与牺牲者,而透过多种权力要素在争斗中的浮现,明晰可见影响身体自主性的具体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

其一,科技赋能促使的身体本质认知转变扰乱身体自主性的判断。随着赛博格身体、虚拟身体、数字身体等多种物理身躯与技术耦合的身体形式出现,身体似乎成为可被任意改造的客体,这冲击着我们对过往传统的身心关系认知。尤其是立足于技术视角,数据算法涉足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更是在身体其中,赫拉利指出“生物是算法。每种动物(包括智人)都是各种有机算法的集合,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自然选择而成”<sup>[12]</sup>。可以说,技术对身体的介入正重塑人们对身体本质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正消解着现实与虚拟、有机与无机、固定与流动之间的分明界限,并指涉着身体正以具象化的数据信息形式出现。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下的数据信息并不能视为一种物质或者能量,而是一种感受性关系<sup>[13]</sup>,这意味着传递信息的实践并非单向,在生成内容的同时,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内容进行阐释,并具有一定的媒介间性,这与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与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感知世界的媒介与枢纽<sup>[14]</sup>的理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基于这种意味,数据正重建当下的身体图像。以在线社交为例,身体借助数字媒介,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塑造虚拟化身,此时的身体由各类信息数据填充而成。进一步而论,技术化身的出现是为了缓解身体缺场带来的心理焦虑,故在线社交的双方可以适时将怀疑搁置,形成彼此都认可的技术化身能

替代肉身在场的共识。而在数字技术更新迭代的语境下,这种共识将成为人们进行在线社交默认的前置交流条件,并形成大众对当下身体本质认知的新常态化理解。然而,虚拟化身并不能直接还原肉身真实的所有特征,它只是对身体的部分外观描摹和某些身体特质的碎片化数据堆叠,再加上技术为屏幕前的身体提供编辑、加工和改造的功能,经过各种美颜和P图塑造的理想化身躯早已和身体本身天差地别,但人们却心甘情愿沉醉在数据技术打造的“善意的谎言”之中。在这种认知下身体自主性难免遭到影响,并在无意识中接受技术对身体的支配与干预。

其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构建主导身体自主性的霸权。在过往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结构自上而下只存在单个信息传播中心,并以精英式引导为特征,此时身体是被动的信息接受主体,没有选择余地。随着互联网等媒介的发展兴起,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垄断格局被打破,信息中心——接受主体这种传统的二元传播形式呈现去中心化,并向网络辐射状传播形式转变,在此身体成为信息接受与创造的主体。诚然,现有信息传播方式打破过去时空界限的阻隔,给予身体在数字实践中发挥最大程度的自主性,但吊诡的是肉身离场的实践同时也在推动身体数据化加速的进程,自然身体逐渐被数据身体所覆盖。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身体、情感和想象中的风景,以及对这些空间的体验,都是由数据构成、增强并调节的<sup>[15]</sup>。换言之,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交媒介的内嵌,在推动信息传播方式革新的同时,也在改造以身体为基点所构建的社会关系,数据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加强对身体的控制。正如线上社交中的肉身被技术化身所替代,仪式性的虚拟身体出席制造了身体在场假象,这意味着完全依靠数据身体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构造不受时空阻隔的交流语境,此时数据身体占据了从前由物质身躯主导而构建的交流语境的权力上风。数据身体以主宰的姿态充分发挥其在构建线上沟通语境的霸权,当人们意图脱离符号式的在场就会导致在线社交语境构建的崩溃,一切不确定与未知的心理焦虑将会扑面而来。由此看来,线上交流语境的构建在无形中增强了对身体的控制,身体本体的自我意志显然被左右其中,并被数据身体排挤与遮蔽。

其三,资本增殖追求对身体自主性的商品化。进入数字时代,数据信息与身体的实践互动正践行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表面上社交媒介看似为身体进行数字实践提供免费服务,实则通过算法技术收集用户身体数据,与广告商合谋进行模型分析或数据买卖以此牟取巨额利润。在这一视角下,基于互联网普遍性与智能技术驱动的社交媒介应用广泛性,以及资本市场强悍的扩张力,这种商业模式成为互联网业内默认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大数据的技术宰制下,传统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的过程正被颠覆,身体沦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一方面,物质身体被社交媒介解构为数据身体,在使用社交平台提供的服务中,用户需要同意平台对个人信息数据的追踪与收集的协议,才能获得免费使用平台服务的准入资格,而后续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收集,则被用以构建用户精准画像,以便提高广告商投放广告内容的精确性和针对性。基于此,有血有肉的身躯沦为被技术算法不断分析解读的数据模型,用户成为免费生产数据又主动提供消费资料的数字劳工。另一方面,由身体数据建构而成的消费网络促进对个体自主性与精神的精准治理。以智能家居的广告信息推送为例,用户的生活细节被后台记录整理转化为商业可分析的数据,此时用户的消费习惯会在算法技术的内容推送引导下逐渐从商场等线下空间转向线上商城。长此以往,个体过度依赖于技术带来的便利体验,会无形服从于由消费网络制定而成的私人化和个性化的管理体系当中。可以说,在资本的视角下,技术算法的效用起点是将人与物全面的数据化<sup>[16]</sup>,并最大限度地牟取其

中的价值。在转化的过程中,身体本身被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导向诱入迈向商品化的道路,身体自主性便在数据宰制中遭到削弱。

### 三、焦虑缓解:在人机共生新常态中寻求内在平衡的现代启示

身体在数据算法干预下陷入被动之中,被信息主宰意志,呈现出强烈的被反身操纵特质,而为了摆脱被数据任由宰割的局面,又主动加强对数据算法的规制并采取一刀切的管理举措,身体在焦虑中反复挣扎,不免陷入与技术对立的二元认知窠臼中。而立足于人机互融共生的数字语境里,算法技术并非只能选择与身体对立,我们能从中探寻到平衡彼此的另一种有效缓解身体异化焦虑的可能。

首先,重新审视技术与身体之间相互实践刻写的关系。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技术越来越多地侵入了生命的每一刻”<sup>[17]</sup>,其指出当下技术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人们已愈发脱离不了技术而独自存活。进一步而言,数据作为延伸身体感官感知的技术产物,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深入感受体验都有赖于它将人们与世界联结,并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深化身体实践的内涵与意义,但这并不意味身体对技术需要唯命是从。曾有学者发出担忧的预示,认为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海量数据学习,不断进行分析和总结能归纳并构建出一套自适的思维系统,它们有望具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sup>[18]</sup>。但不可忘记的是,技术并非无中生有而存在的,数据的生产与收集利用都来源于身体,不管是数据身体的构造,还是数据模型的构建都表明了“身体是构成了技术的源泉”<sup>[19]</sup>。数次的科技革命更是验证了技术的更新迭代并不能脱离身体作为研发的参照,在这一层面而言,身体天然对技术具有一定掌控力,而不是作为任由智能媒介提取数据的工具。此外,身体异化表征的显露并非为了加强人们身心的焦虑和担忧,而是意在警醒人们对身体状态及时关注与改进技术其中的不足。归根到底,技术的研发是为人类进行服务,若技术与人类选择背道而驰,势必会遭到反击,当人类强行干预技术的发展进程也会遭到反噬,故双方若站在对立面那毫无疑问只会迎来一场零和博弈,将彼此视为“伙伴”而非敌人更有助于双方在实践交互过程中协同进步,打破身体主体与技术逻辑长期互相争执的失衡局面。

其次,树立健康的身体审美导向。在媒介技术的辅助下,身体走进了视觉文化转向和大数据盛行的时代,身体极尽可能展演自己的同时也被大众媒体别有用心的视为某种审美标杆向大众宣扬与怂恿模仿,在这些异常的审美风尚背后,造就的是身体伦理失范问题的出现。波斯曼指出,媒介倾向于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来构建世界,为一种事物进行更高价值的赋予,并放大某一种感官与技能,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sup>[20]</sup>,这意味数据技术左右的审美风尚正让人们陷入对所谓的完美身体形象的盲目崇拜中,这种将异常身体神圣化的导向,无疑容易使人们陷入不自知的身体狂欢之中。显然,数据技术显现出来的负面效应在侧面提醒人们需要提高警惕,在面对这种异常的身体文化思潮中只有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展开反思,才有助于人们对现有身体审美景观建立正确的认知。在数字语境下,原有的身体审美认知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相关话语体系的革新,唯有健康积极导向的身体话语得以构建并存在,才能更好引领人们建立理性客观的判断认知并保持独立思考。当下的身体美学边界更具多元性与复杂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身体审美认知边界的拓展具有重要影响,人们也需要提高个人相应的媒介素养,只有对身体审美认知进行及时纠正与增强个人媒介使用素养两相结合,才能更好缓解身体审美焦虑并建立健康积极的审美取向。

再次,确立生命伦理底线。在前数字时代,技术仅被视为达成人类实践目的的工具与手段。在当下

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研发出现后,技术逐渐形成仿人类的思考模式,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实践认知范式。其中,显著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技术中心主义,其二是人类中心主义。前者而言,科技的数次更迭给社会带来前所未见的变革,人们无意识地对技术愈来愈倚重,由此在社会逐渐形成理性技术崇拜风尚,人文关怀、法律与道德等价值观退居二线甚至被忽视。于后者而论,人类被视为一切实践活动的衡量尺度,事物价值的赋予由人类规定,而在技术对身体介入下,人类变得不再纯粹,在进行问题决策时并不能分清技术是否对问题判断存在影响,此时人类的话语说服力似乎有待存疑。可以说,无论哪种倾向都将身体与技术对立并导向非此即彼的绝路,同时也诱发技术逻辑与身体主体的价值导向相异的争论。实际上,技术本没有伦理价值导向,而是研发者在设定技术程序时进行赋予,这意味技术与人类在实践意义与伦理标准上可以达成一致。毫无疑问,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发展并不能脱离技术的辅助,却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法律、人文价值、人性关怀等价值导向要随之被抛弃,而强调伦理原则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它能唤起人们研发科技的初衷,使人类存有必要的敬畏心。近年来,技术哲学、机器伦理与身体伦理已然成为探讨人类与技术关系的重点研究方向,传统的身体伦理认知正受到技术逻辑的冲击影响,故“后现代”与“后人类”等话语概念出现有其必要性,以超越当下的长远视角看待可能要遭遇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直面身体与技术实践互动时产生的种种伦理问题,并在伦理价值判断上达成统一。

最后,呼唤身体主体性的回归。数字时代的到来,似乎在告诉人们另一种可能,即虚拟空间成为现实空间的另一种替代,甚至给予人们超越现实的身体体验,这为数据身体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然而,数据身体存在的基础离不开物质身体的支持,实现实践与交流的旨归还在于肉身的在世,换言之,没有肉身的存在人们无法与世界产生联系。但在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干涉下,人们对数据身体的关注远远大于物质身体,并意欲利用数字身体遮蔽身体主体,从而满足技术对身体实现完全操纵的诉求。以ChatGPT诞生为技术努力获得独立主体地位的标志而言,技术正参与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建构与重塑。在技术的辅助下,身体确实获得穿梭虚拟与现实不同维度中的自由,同时也迎来被形塑、被改造、被控制的困境,然而在这些过程中身体并不是在重复过往的磨难,而是在不断修正歧路,这揭示了仅在消极视角中焦虑身体异化现状是肤浅的。事实上,它给予人们双重含义:一方面,身体作为技术的宿主需要直面的危险在新情境下将更为复杂,当下身体被信息技术异化的处境正是在发出危险预示,意在提醒人们切勿沉迷于技术构造的乌托邦中。另一方面,它又启示人们需要重视身体主体性,时刻谨记身体发挥能动性主体在自身而非“他者”,只有回归身体本身进行思考,突显身体主体性,才能不被技术凌驾与奴役。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sup>[21]</sup>,当人们把身体复归身体,技术还归技术,才能在冲突与焦虑中寻求到平衡的可能,从而实现身体本质意义的探求与身体内在生命意义的追寻。

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探讨是由来已久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在数字语境下依旧有其探讨价值并历久弥新。列斐伏尔指出“人的不断实现包含了不断加剧的异化过程,反过来,不断加剧的异化过程也包含了人的不断实现”<sup>[17]</sup>。显然,人机共存的社会现状将成为未来常态,但我们期待的并非身体对技术形成无止境的依赖,而是将技术视作身体“外部组件”,并对其拥有绝对控制力,可以有余地选择享受其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能有权利抛开技术枷锁,回归自然身体本身。从这一层意义而言,身体看似被局限于反身操纵与主动控制的双重向度中,实则也隐含了第三条路径,这也正是身体与技术实践互动时体现的内在深刻本质,即在克服异化中回归自身,实现自我救赎与自我解放。

参考文献:

- [1] MONAHAN T, WALL T. Somatic surveillance: corporeal control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s[J].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07, 4(3): 154-173.
- [2]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76.
- [3]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102.
- [4] 杨庆峰. 翱翔的信天翁: 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3-101.
- [5] 叶郎. 美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6.
- [6]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3.
- [7] 理查德·舒斯特曼. 生活即审美[M]. 彭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03.
- [8] 睦莉. 网络技术“信息茧房”的生成机理与破解路径[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0(6): 84-97.
- [9]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97.
- [10]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2.
- [11]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7.
- [12] 赫拉利·尤瓦尔. 未来简史[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353.
- [13] 王天恩. 信息及其基本特性的当代开显[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1): 90-113+206.
- [14]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16.
- [15] LESZCZYNSKI A. Spatial big data and anxieties of control[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5, 33(6): 965-984.
- [16] 王敏芝. 算法之下: “透明社会”的技术与观念[J]. *探索与争鸣*, 2021(3): 29-31.
- [17] 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M].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34-53.
- [18] 林命彬. 哲学视角下智能机器在自我意识和行为意义上的突破[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6(6): 8-14.
- [19] 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80.
- [20] 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
- [2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6.

## Two Dimensions of Human Body in the Digital Age: Reflexive Manipulation and Active Control

WANG Wanqing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various media technologies not only provide a convenient experience for human body, but also bring about the alienating and rewriting of human body's representation from inside out.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echnology to exert its effect further reveals that individuals have been unconsciously trapped in the ethical dilemma of the collusion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 the current new normal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two dimensions of human body do not lead to binary opposition, but lead to another possibility, that is,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meaning of balance between human body and technology, which can rivet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ody and help alleviate the anxiety caused by loss of control over human body.

**Keywords:** data algorithm; digital technology; subjectivity of human body; anxiety over body; internal balance